



西华大学人文学院天津学术丛书

新时期以来文学制度研究 以茅盾文学奖为中心的考察

Xinshiqi Yilai Wenxuezhidu Yanjiu
Yi Maodun Wenxuejiang
Weizhongxin De Kaocha
范国英 著



四川出版集团 巴蜀书社

新时期以来文学制度研究

以茅盾文学奖为中心的考察

Xinshiqi Yilai Wenxuezhidu Yanjiu

Yi Maodun Wenxuejiang

Weizhongxin De Kaocha

范国英 著

四川出版集团
巴蜀书社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新时期以来文学制度研究:以茅盾文学奖为中心的考察
/范国英著. —成都:巴蜀书社, 2010. 8

ISBN 978-7-80752-665-0

I. ①新… II. ①范… III. ①文学研究—中国—当代
IV. ①I206.7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10)第 161149 号

新时期以来文学制度研究:以茅盾文学奖为中心的考察 范国英 著

策划组稿	段志洪
责任编辑	潘伟娜 张振兴
出版	四川出版集团巴蜀书社 成都市槐树街2号 邮编:610031 总编室电话:(028)86259397
网 址	www.bsbook.com
发 行	巴蜀书社 发行科电话:(028)86259422 86259423
经 销	新华书店
照 排	四川胜翔数码印务设计有限公司
印 刷	四川翔川印务有限责任公司
版 次	2010年9月第1版
印 次	2010年9月第1次印刷
成品尺寸	210mm×148mm
印 张	7.25
字 数	180千
书 号	ISBN 978-7-80752-665-0
定 价	16.00元

本书若出现印装质量问题,请与工厂联系调换

西华大学人文学院文津学术丛书编辑委员会

顾 问：张小南 孙卫国

主 任：王民朴 李劲松 王小林

副主任：曹顺庆 谢应光

编 委：（按音序排列）

曹顺庆 陈鉴昌 范国英 纪国泰 段志洪

李 诚 刘小兵 栾道成 潘殊闲 余正松

唐小林 王 方 武小军 徐行言 谢应光

杨绍林 曾加荣 钟世伦 赵义山 张 帆

郑家治

主 编：谢应光

副主编：潘殊闲 段志洪

西华大学党委书记张小南题辞

弘扬人文精神
传承道统学术

张小南

西华大学校长孙卫国题辞

融会中西文化
探索文艺新知

孙卫国

有10部，虽然数量不算多，但已从多方面集中展示了近年来西华大学人文学院中国语言文学学科团队所取得的学术成就，具有鲜明的研究特色和学术价值，表现在：

第一，学科涵盖面较广。十部专著200余万字，涉及了中国古代文学、中国现当代文学、文艺学、古典文献学、语言学与应用语言学、比较文学等多个二级学科。

第二，研究特色鲜明。巴蜀文学与文化是该学科点的研究重点，多年来，有一批学人勤苦耕耘，收获颇多。这次入选丛书的专著，也在这方面有鲜明的体现。仅以巴蜀文化名人研究而言，丛书设专题研究的就包括司马相如、扬雄、李白、杜甫、“三苏”、费经虞、张问陶、廖平、郭沫若、贺麟、何其芳等十多位。这些研究涉及诗、文、词、赋、小说、学术著作等，涵盖经学、哲学、诗学、文献学、史学、美学、心理学等多领域。

第三，宽阔的学术视野。本套丛书具有宽阔的学术视野，既有对中国传统文化的追寻与反思，也有对海外相关研究的关照与梳理；既有对乡土作家作品的挖掘深究，也有对其他地域的作家作品的考述辨正；既有古典的思考，也有现代的品味；既立足于文学，又不囿于文学。

第四，研究方法丰富多彩。本套丛书不拘一格，研究方法丰富多彩。既有传统的研究方法，也有新兴的边缘交叉的研究方法。

第五，学术价值不菲。本套丛书虽然体例不同，有的自成体系，有的单篇零什，但总的看，都有很好的学术价值，有不少研究发前人所未发，具有较高的学术价值和意义，有的甚至填补了学术空白。

这套丛书的出版，让我们对西华大学人文学院的中国语言文学学科有了全新的认识。丛书一方面是对其过去一段时期学术成就的汇集展示，一方面又预示着一个新的里程碑的开始。作为一个正在蓬勃发

展的文科学院，西华大学人文学院还有很大的发展空间和潜力。如果继续保持这种发展态势，沿着自己确定的奋斗目标，孜孜以求，永不懈怠，相信在不久的将来，西华大学人文学院一定能够取得更加丰硕的成果，为繁荣发展哲学社会科学，为加快四川文化强省战略的实施，为守护好、建设好我们共有的民族精神家园，作出自己应有的贡献。

文以载道，津以渡人。文津学术丛书绍继先贤，沾溉来学，功莫大焉。

是为序。



2010年1月31日

前 言

西华大学人文学院的前身是成都师范专科学校中文系，至今办学历史已有三十多年。在三十余年的历史积淀中，经过一代代学人的不断努力，学院的学科发展取得了显著的成绩，已经形成了鲜明的研究特色和学术风格。今天的西华大学人文学院中文系，拥有教授、博士、兼职硕导 15 人，学术梯队比较合理。在蜀学研究、中国诗学、应用语言和地方文化等方面，研究特色鲜明，在国内外有一定的影响。

为了总结学术研究经验，进一步推广我院的学术研究成果，在学校党委、行政和有关部门的大力支持下，在学校社会科学联合会的具体指导下，我们组织出版了“西华大学人文学院文津学术丛书”一套，共计 10 本，约二百多万字。丛书的出版，既是对我院学术研究成果的一次集体检阅，又是对学界关心和支持我院学术事业发展的前辈和好友的一次学术汇报。我们希望通过丛书的出版，不断推进我院学科队伍的建设，促进学术研究的积极发展，推动学校社会科学的进一步繁荣。

作为一个地方性的综合性大学，学术研究应该为地方的经济、文

化建设和社会发展服务，本套丛书在服务地方上有着明显的特色。有的著作，对四川尤其是成都及周边地区的历史文化名人有专门的研究；有的著作，对中国诗学，尤其是四川明清以来包括现代的诗歌理论进行了独到的探究；有的著作，对四川特别是成都及其周边地区的语言和历史有着精到的阐发。总之，在基础性的学术研究活动中，本丛书有力地体现了服务地方经济、文化建设和社会发展的宗旨。

本丛书在出版过程中，还得到了有关专家的指导，四川大学文学与新闻学院院长、博士生导师、长江学者曹顺庆教授拨冗为丛书作序，西华大学党委书记张小南教授、西华大学校长孙卫国教授专门为丛书题辞，在此，丛书编委会全体成员对他们表示衷心的感谢。对西华大学其他校领导和相关部门的关心和支持，表示诚挚的谢意。相信在学校党政领导的正确领导和人文学院全体教职员工的共同努力下，人文学院的学术研究一定会得到更大发展。

西华大学人文学院文津学术丛书编委会

2010年1月25日

目 录

导 言·····	(1)
制度·文学制度·文学评奖·····	(11)
文学制度与文学的边界·····	(20)
新时期文学制度现代化探索的前提·····	(27)
文学评奖：新时期文学制度现代化探索的重要面向·····	(37)
文学制度现代化的探索	
——论 1978 年的文学评奖·····	(48)
茅盾文学奖：新时期文学制度现代化探索的必然结果·····	(59)
作为文学制度的文学评奖与茅盾文学奖·····	(68)
文学制度：新时期文学的另一种话语阐释·····	(89)
对新时期文学的一种历史性反思	
——以 1978 年文学评奖的运作机制为视点·····	(96)
1978 年的文学评奖制度与文学存在样态·····	(107)
潘多拉的盒子：作为文类的小说的兴起·····	(116)
现实题材的获奖作品与茅盾文学奖的生产机制·····	(125)
历史题材的获奖作品与茅盾文学奖的生产机制·····	(134)
在差异中比较：第六届茅盾文学奖解析·····	(147)

论完善茅盾文学奖评奖的合理性问题·····	(155)
论 20 世纪 90 年代以来的文学评奖及评奖机制的形成·····	(163)
市场体制下权利场对文学场的介入·····	(174)
市场体制下的文学场·····	(189)
论资本对地方文化的介入·····	(198)
身体隐喻与中国文论的存在形态·····	(206)
附录 1 ·····	(215)
附录 2 ·····	(219)
后记·····	(222)

导 言

—

目前,伴随着西方文艺社会学理论的进入,如艾斯卡皮的文学社会学,哈贝马斯的“公共空间”理论,布迪厄的“文学场”理论,比格尔的“文学体制与现代化”理论,以及文化研究的种种理论和实践的影响,形而上的、“纯化”的文学观念受到了越来越多的质疑。在这一语境下,文学自身必然包括的“物质”性因素(其中一个最为重要的面向就是文学制度)已经引起许多学者的关注。在笔者看来,此类研究大致可分为两个方面:一是从文学制度本身入手,一些学者开始思考中国现代文学制度的形成、发展等诸方面的特征^①;二是对文学制度包括的诸多面向如出版、社团、杂志等方面的研究。应该说,对杂志、社团等方面的研究主要集中在现代文学和“十七年文学”这

^① 如王本朝《文学制度:现代文学的一种阐释方式》(《文艺研究》2003年第4期),张颐武《“现代性文学制度”的反思》(《文学自由谈》2003年),《湖北大学学报》2003年第6期发表了关于“文学制度”笔谈的四篇文章(王本朝《文学制度与文学的现代性》,旷新年《文学存在的权力与制度》,刘川鄂《创作自由:文学制度的指归》,罗岗《现代文学·教育体制·知识生产》),日本学者藤井省三的《鲁迅〈故乡〉阅读史:近代中国的文学空间》(新世界出版社,2002年),等等。

两个历史时段，并且已经取得了一定的成绩^①。毫无疑问，目前对新时期文学制度的研究，是这两类研究中极为薄弱的环节。

新时期文学制度作为伴随新时期文学进程出现的一个重要文学现象或文学事件，对依然身处“当代”历史语境的我们来说，如何放弃简单的主观价值性研究带来的情绪化态度的干扰，实现对研究对象的客观和历史的分析，就是本项目研究是否具有合理性和有效性的关键。另一方面，文学制度包括了调节和管理文学与社会、文学生产和接受等方面的一整套的文学机制，怎样选取一个有效的视角来切入新时期文学制度的研究，也是本书需要解决的首要问题。

在这两个问题的基础上，本书确立了基本的研究思路和研究框架。

正如布迪厄在《实践与反思——反思社会学导引》中所说，在从主观立场对世界做出分析之前，必须对世界做出客观主义的理解。因为行动者的观点必然受到其在客观社会空间中所占位置的制约，因而本书对文学评奖与新时期文学制度的关联研究主要采用的就是一种客观的、中性的知识话语。

同时，文学制度是调节和管理文学活动各个面向的一整套复杂系统，那么选取何种角度来有效切入新时期文学制度的研究无疑是本研究需要解决的又一个关键问题。应该说，新时期文学评奖制度的建立

^① 对现代文学杂志和社团的研究，如王晓明研究《新青年》和文学研究会的《一份杂志与一个社团》，李欧梵研究《申报·自由谈》的《批评空间的开创》，等等。对“十七年文学”杂志和出版的研究目前也引起了许多学者的注意。如吴俊对“《人民文学》与‘十七年文学’”的关联研究，郝富强的《“十七年”文艺稿酬制度研究》，等等。

无疑是新时期文学制度现代化探索进程的极为重要的一个面向^①，而目前对文学评奖的研究是此类研究中极其薄弱的环节。从资料来看，对文学评奖的研究大抵还停留在一种表面的并且相当情绪化的层面上。

在笔者看来，造成这一状况的主要原因既与文学评奖自身的属性紧密相关，同时，更受到某种主观因素的制约。正因为文学评奖具有某种使一个作家或一部作品成为“圣物”（布迪厄语）的可能。因此，在对文学评奖的研究过程中，首先就会受到某种主观价值立场的干扰，而这无疑就是导致对文学评奖的研究停留在表面化和情绪化层面上的最为主要的主观因素。

笔者认为，我们要理性地看待“文学评奖”与“文学”的关系。应该说，“文学评奖”与“文学”的关系并非简单的价值评判关系。作为文学制度的一个面向的文学评奖来说，“制度”与“文学”的关系以及“评奖”与“文学”的关系必然会投射于文学评奖之上，并形

① 在1978年以前，与大规模的文学、艺术批评活动形成鲜明对比的是，文学或各类艺术的评奖寥若晨星。材料表明，就小说来看，在1978年由《人民文学》主办全国优秀短篇小说评选以前，我国仅有三部小说作品获奖。它们是：周立波的《暴风骤雨》和丁玲的《太阳照在桑干河上》于1952年分别获得“斯大林文学奖”；胡万春的《骨肉》获“国际文艺竞赛奖”。在1978年之前，全国性的文学、艺术类的奖项仅有1954年由中国人民保卫儿童全国委员会举行的全国儿童文艺创作评奖和《大众电影》编辑部在60年代初期举办的“百花奖”。在这一历史背景下，1978年的全国优秀短篇小说的评奖就是“空前的、过去没有过的”（茅盾《在一九七八年全国优秀短篇小说评选大会上的讲话》，载《人民文学》1979年第4期）。自1978年以后，逐渐设立的针对各种体裁的全国性文学评奖便成为当代文学一段时期——70年代末期到80年代中后期——内的一项非常显著的事件。在当时，一些重要刊物的办刊宗旨，就明确地提出，是为了进一步发展和完善文学评奖活动，如茅盾为1980年创刊的《小说选刊》所写的发刊词中，“为评奖活动之能经常化，有必要及时推荐全国各地报刊发表的可作年终评奖候选的短篇佳作。为此，《人民文学》编委会决定增办《小说选刊》月刊”（茅盾《发刊词》，载《小说选刊》1980年第1期）。并且，在社会主义的文化生活和政治生活中具有重大意义的各大报纸，如《人民日报》、《光明日报》、《文艺报》等大多都会对每次评奖发表相关的报道和评论。而到了90年代，更是出现了众多名目繁多的文学评奖。

成文学评奖及评奖策略上的基本特点。而且，就具体的文学评奖来看，它如何作用，以及具有的作用，必然又会受到不同历史阶段文学场域的影响和制约（而文学评奖自身所具有的对社会场域或对作为次场的文学场域的快速反应的能力，使其成为实现对新时期文学制度演变轨迹研究的一个有效的视角）。只有在这一认识的基础之上，在研究的过程中才能排除某种居于主观的、情绪化的态度的干扰，实现对文学评奖的客观的和历史的分析。当然，在此并非否定对对象的某种主观能动性，只不过是强调，主观立场和主观能动性的建立和实施必须以对对象的客观主义的分析为基础。

二

安东尼·吉登斯的《现代性的后果》，以现代性的制度纬度为视点，对现代性做出了具有某种深远影响的研究。在这部著名的关于现代性研究的论著中，吉登斯认为，资本主义和民族国家是“促进现代性制度加速发展与扩张的重要制度性因素”^①，也就是说，现代性制度是伴随现代化过程出现的一个产物。而文学制度毫无疑问是现代性诸种制度（如政治制度、经济制度、教育制度，等等）中的一个方面。彼得·比格尔在《先锋派理论》中也指出，艺术作为一个体制，也即是“艺术”作为具有相对独立性的社会子系统，是伴随着资本主义社会的发展，出现的经济、政治制度逐渐与文化制度的分离过程中而得到确立的。在《文学体制与现代化》中，比格尔做了更为清楚的表述，文学制度是自18世纪启蒙哲学以来，把每个领域的认知潜能

^①（英）安东尼·吉登斯《现代性的后果》，田禾译，译林出版社2000年版，第55页。

从玄奥的形式中解放出来的结果。它与文学、道德、政治等分化为独立的领域是密切相关的^①。这样一来，我们不妨说，自现代（这里的现代强调的是与现代化进程相对应的时间概念）以来，文学必然是寄寓于一定的文学制度的“场域”之中的。

实际上，中国具有这种现代意义上的独立分化从晚清就已经开始。1905年中国科举制度的废除，本身就标志了现代学科建制的开始。“五四”以后逐渐有了文学、史学、哲学、经济学等多门学科。这本身就标志了具有现代意义的制度性分化的开始。只不过，由于中国的现代性进程处于特定的社会历史语境之中，而这种独特的历史语境就构成了中国现代性的前提，并参与或影响中国现代性架构，因而其文学制度的设立也就形成了某种与西方相异的不同色彩。正如艾森斯塔特所言，“在非西欧社会，对最初的西方现代文明的不同主题和制度模式的挪用，并不必按照最初的形式接受。更确切地说，它带来了对这种主题的不断选择、重释和重构，这导致了现代性的新的文化、政治方案的不断形成和新的制度模式的发展与重构”^②。

洪子诚在《“当代文学”的概念》中就指出，“当代文学”这一术语与“现代文学”相比本身更强调文学与政治的纯粹性。这本身就从一个层面表明了，新中国成立以后，在探索和建立社会主义文学的文学规范过程中，文学与政治之间的复杂关系更是不断地被简单化和纯洁化。这样一来，作为无产阶级革命事业一部分的文学就掩盖了文学必然具有的特殊性。与此相应，党对文学的管理和调节也就仅仅是通过组织，并且是采用行政手段的方式来直接完成，“思想上的决断就

① 请参见（德）彼得·比格尔《文学体制与现代化》，周宪译，载《国外社会科学》1998年第4期。

② （以）S. N. 艾森斯塔特《反思现代性》，旷新年、王爱松译，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06年版，第27页。

往往转化为行政上的决断，组织领导事实上也就成了行政领导。最终思想与政治领导也就通过各级组织转换为了行政领导”^①。另一方面，又如汪晖所言，中国的现代性历程是在全球资本主义的背景下展开的，本身就是一种反现代性的现代性，其最根本的一个特点就是对现代性中包含的一个重要面向——理性精神——的质疑。正是在此意义上，在中国的现代性历程中，直到社会主义建设的初期，就没有实现各个领域的相对独立和分化。正是没有实现各个领域之间的相对独立和分化，因而在社会主义建设的初期，政治成为界定文学的一个极其重要的因素，或者说文学在那一时期负载了过多的意识形态功能，所以这一时期的知识场域往往被称为是“他治性”（heteronomy）的。

在这一态势之下，从新中国成立到十一届三中全会召开这一时间内，对文学的认识往往都会超越于文学之外，文艺论争往往衍化为大规模的政治批判运动。而这必然就导致了文艺生产力的大幅度下滑。因此，“文革”后，如何提高文学艺术水平，就成为摆在大家面前的、迫切需要解决的问题。实际上，正是在社会主义建设的初期，文学发展面临的问题给我们提供了某种历史契机，使这个问题——怎样来有效框架和引导社会主义文学——成为可能，而对这个问题的回答无疑又受到其所处历史语境的影响和制约。正如比得·彼格尔在《先锋派理论》中所言，任何概念范畴的产生都是特定历史语境下的产物，因而，我们对研究对象的研究就不能超越对象做某种抽象的研究，而是必须将研究对象历史化。

汪晖在反思当代中国的思想状况与现代性问题时，指出，20世纪80年代新启蒙思想批判的基本出发点是建立在西方与中国、现代

^① 朱晓进等著《非文学的世纪：20世纪中国文学与政治文化关系史论》，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2004年版，第267页。